

陈翰老自述

1983.1.28 下午

关于我母亲，我想再补充几句，我这个人的脾气、性格都受我母亲影响。母教、母教，这很重要。

我对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有许多看法，不知该写进去？我愿意将这些放进^书中去，我看可以这样写：陈翰笙有一次同××谈话，讲母教对他的影响很大，母教是那样地重要、深刻。他跟我讲，现在的家庭教育太不行了，原因之一是双职工太多，加上现在的幼儿园太少，因此儿童教育很差很差；学校教育也不好，总之，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不行，数量也不行，质和量都不行。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双职工多，何谈根本没必要搞双职工呢！要解决家庭生活，勉强双职工。本来可以一个人工作，偏追求名义上好听：一、男女平等，二、不反校的人也去教书，不教书的人也去做干部了。这样一来，社会教育搞不好，工作没干好，家庭教育也完了。

我批评这些人，有人以为我是反党的，对中共有意见，还责备我，说既然有意见，为什么不给党组织写信，我说，我写有什么用，还不是石沉大海！不但我没有用，吴玉章同志有一次曾同我谈^对人民大学的组织、教课不满意，可是他说，这有啥法子呢！这个要写进书中去。

对改革
一些向你看
家庭教育

胡越邦同志这月21日在职工政治理论工作会议上讲了
好多，闹了这么多年，多冤枉呵。可是现在还有人讲，我
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光讲美国的民主，却不知美国的民主是
假的。我不知道是假的？可是良心假眼：他们可以批评总
统，批评里根的很多；我们的人民日报，文革前，后都是
坏的不登，只登好的，这一套是苏联党报的，极委不报
忧，这是民主吗？有人以为我是美国派，美国民主是假民
主。我说美国过去比现在民主，现在也有民主的余波，我
们却一点也没有。有人问我：“为什么我们搞成这个样子？”
我说：“盲目学苏联，不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是错了，
办事情，只是机械模仿，今天吃了亏。”人民公社、教育、
体制都是一样，党政混在一起不分。胡越邦同志讲话很清
楚，就是要党政分开。

人家说我好批评，说你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是老
党员，却和党不走一条路，为什么不写信上去；我说不过
他，就拿出胡越邦同志21日的讲话。他又说，你开会为什
么不讲？我说，在国际上是研究所驻（在沈阳），我是党组
成员，梅益是主任；74年搬家了，叫国际关系研究所，
74年以后我是顾问了，过去我当过研究所长，年岁大了，变
成顾问。过去，袁泰是我们党小组长，不记得是74年，还

对胡越邦
同志的批评

是1953年，江青去天津小靳庄，我在开会时批评了江青，会上的人脸色都变了。袁泰是党小组长，就报告了“管党”的陈清（女）。陈清喊我去，对我说：“翰老，你这样不行，千万别再讲了，我不报告，整材料给你去掉。”她是好心。第二年4月，我要请假去上海，外交部不批准，我想可能有道理，我本想结伴去的，后来人家走了，失去机会，也就不去了。后来我想，外交部不让我去是爱护我，我一讲话，在上海要倒霉的，那里是四部的大本营，这怎么敢说党内有民主呢？后来，袁泰死了，党内开会也少了，我的组织关系转到社会科学院。因我年龄大了，他们不再烦我了，所以没给我编党小组，我成了不是党员了。

有一年，人家打电话叫我，让我去开党小组会，是办公室那个小组，有十多个人，人家都有具体工作，和我毫不相干。我到了那里，还没等坐下，就有人说：“陈翰老，今天办公室开组织生活会，和你关系不大，你就不用参加了。”在国际关系研究所时，我还去开小组会，到社会科学院后音讯全无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哪个大组、中组、小组参加党的会（麦根：他看文件，开会都没参加，好多事都不了解。）

前两年起草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”，组织许多人参加，

党内关系不
他在

北京一十人，北京之外三十四人，共四十四人讨论。第一稿时，我发表了许多意见，有些也采纳了。第二次会，社会科学院有个秘书给我送材料，我也参加了，以后我就没参加过什么。党内没有我陈翰笙，讲起来还是照顾我。

两个月前，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的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党小组明天开会，你来吧。”我说，我这里有时要安排表，没办法，只好请假，下次请早点通知。两个礼拜前又通知我明天开会，第一我不知是哪个组，第二又是头一天才通知我，我只好又请假了。现在我想，这样不对，我被动了，我是党员。我跟学部讲了，我们许多人会令大，离休了，我们楼516住的是吴大章，我参加他那个党小组好了。

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，因为有人说我子在党内提意见，而在外面讲，所以我才讲这些话。因为党内没有民主气氛，所以闹出这个文化大革命来，这是历史问题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党内党外没有民主作风，直到现在才讲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。教育问题，这是近三年来的转变。从30年，到近三年，良心干的，害了多少人哪！

我尽管没离休，要求编在离休人的党小组里，石西民在双楼，年会大的人有。讲这一大堆，我还是讲党内没有民主，教育怎么能够搞好，文化怎么能够进步：千家驹的好批

评，人家讨厌他。批评好呀！

人家说我正直，像我的母亲……

- △ 李雅梅说：我哥很像母亲，倔（耿）得很，真心话也不行，哥之就是这个直筒子。后来我表兄陈子，俩间一隔开，前住邻居有一女孩子，父母死了，跟着哥之嫂子过。有人给这姑娘作媒，竟把的邻居就捣乱，说这没小女孩子不规矩，想破坏婚事。我母亲就挺身而出说：“这姑娘是我的干女儿，谁说她不规矩？！我负责，我保证！”结果婚事成功，男方很好。现在那个老太（当年的小女孩子）在苏州，也算福了。我哥之也爱管闲事，那年去首都医院看病，门诊排队处有个护士姓平，小平对哥之说：“陈老，我们这里每天上班把凳子搬出去，下班搬进来，麻烦极了。”哥之马上对什么头之讲了此事，下次再去病，就不必再搬进搬出了。还是首都医院，门诊有个化验血的小女孩，她对哥之说：“陈老，我们这届毕业生最倒霉，人家不承认毕业生资格。”哥之再说：“你们班有许多同学吧，同学们可以联名写报告。”过了一年，果然成功了。还有一次，哥之在上海，陪我去会同医院打针，他坐在外边的凳子上等我，同室的一个男孩说起来，那男孩说他哥之不知为什么事给弄起来了，冤枉，哥之也注意让他写报告，或上北京上告。上次黑龙江那个

来告状的事……（事情无结果，布了）

陆翰老接着说：看不惯的，应当讲的，我就讲；我该干的，我就干。这两点像我的儿媳。

关于顾淑型。

顾淑型与焦墨筠是1917年同船去美国留子的，1919年放暑假，顾淑型回天津家中，呆了一段返回美国。我那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大学听讲，焦墨筠是来听我的。有一天，焦说她要去旧金山码头接一个朋友，是无钊人。我一听是无钊人，很感兴趣，就同她一道去码头了。在码头上见面，一谈起来，原来她的父亲我欠过（前面讲过的），还给他磕过头。说起来，顾淑型还比我高一辈呢，因为我母亲也是顾家的，当然我不喊她姨了！她讲无钊话，我也讲，焦墨筠是山东人，她半句都听不懂，于是她就逃掉了。从此，我和顾淑型常来往，焦墨筠也了解我与顾淑型很好。焦墨筠要我同她结婚，因为她信教，我不是基督徒，没法结婚，她失望了，所以我同顾淑型交往更多了。秋天，我回波莫纳，她留旧金山。次年，我仍在西伍德结婚。只请了几个美国人，她的、我的朋友，共七八个人，就算结婚了，很自由。过几天，我去华盛顿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委员会。

顾淑型

会工作。当时顾为君等三人是太平洋会议的代表，我是子
兮会的干事。查良铮、段基珩(音)也在那里，上海二高男
也帮人来看忆，江木林(音)等。这事宜了以后，我去哈佛
大学，顾淑型还留在西耳德，帮人家看家，看孩子，她子
的是教育系，21年毕业的。后来我们一同去欧洲，先在地
中海边(法国)休息了一个月，又去意大利山区呆了一个
月，1922年秋去德国柏林。

22~24年，我们一同回国教书，先做同事的，我在北
大教书，顾淑型参加艺文中学的开发(先在中山公园西边
的二十八中)，创办时在所作暂住的地方，后来搬到灯市口，
校址是高仁山，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，高仁山是搞教
育的。去年我在《中国日报》(英文版)发表文章，讲中国教
育之后搞通文控制，后来接到一封信，是一个美国人写的。
他说看了我在报上写的通文控制，他很有兴趣，想同我谈
谈。他来谈了，后来他是通文控制学校毕业的，这证明外国
人真心自由、开放。

五卅(可说是三一八惨案时)，顾淑型是艺文中学教
长，带学生游行，到钱班(音)同段基珩找政府去，反对放
枪了。我是同顾淑型和她在一起去的。 年

有我一篇文章，叫“三一八惨案目击记”，有几个人后来

的过我。

抱一抱，顾淑型把大衣裹住，躺在地上，没有被子盖着，打着，跟子文一起逃了出来。我和她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三年前“文史资料”50几部有一篇文章，是水利部一个姓杨的付部号，和什么人一起写的，是关于华中分会的，讲到顾淑型，也提到她是艺文中学的教部号。

1925年，我们去莫斯科，顾淑型在《莫斯科》中山大学和王明一起，田汉治方也认识，当时住在莫斯科大学。1926年回来，还在艺文中学。

高仁山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部号，在内部部街46号被捕，他也解了来，不久，李大剑被捕，我们顾淑型在一个日本人掩护下，从天津乘船到神户，办护照到苏联的伯力、莫斯科。1927年，我们在共产国际，国际调查所，高太林去，同我们在一起，比高太林年轻20岁。

28年我们回国，顾淑型仍在艺文中学。蔡文培要我们去中央研究院。我在上海，她在艺文，直到1932年。“一·二八”抗战，蔡文培要办募捐，在交通大学找了廖二，要顾淑型去上海搞捐款工作，当时，蔡文培也在那里。之后，她又回艺文中学了。

我1934年去日本，顾淑型因艺文停办在上海，我们一

同去，日本，又去苏联一年，再到美国。1936年5月~1939年5月，我们俩在香港办杂志《美洲通讯》（45年1月号刊）。“太平洋战争”后，后来桂林，陈叔型办《合作》杂志，认识3岛用替，高士岑也在那里。这个合作社专门制造家庭使用肥皂等用品。

1944年我们去印度，呆两年。1946年3月再去美国，陈叔型在美国干电影和摄影，从46年4月，到50年12月，4年工夫。我们大干布告，她同摄影界布告，认识司徒慧敏。后来，陈叔型参加他修抗日募捐，出了好多气力。《中国建设》80年第1期，记陈叔型那时在美国的情况，翻译出来就可以用了。

51年1月，我们经欧洲回国，她由欧洲本回会去新华社摄影部。文革时，她是中苏友协付秘书，因为：第一，她三次去过苏联，共呆三年；第二，她俄文好；第三，她认识许多苏联朋友。最初刘少奇是这个友协的会长，后来是宋庆龄。宋庆龄找钱俊瑞当秘书长，陈叔型当付秘书长。另外，陈叔型是摄影协会理事，管摄影的一个什么单位，在王府井（可能是图片社）。

文革中我被关起来，陈叔型常给我送衣物。后来她病了，我回去看她，她同我住一晚上，说有些事要谈，可

是陪我回家的那个人不许留下。才几天她就走了。三人陪
我回去料理。她得的是膀胱癌，公家不给看，找私人医生，
说没法治了。她是1968年11月5日走的。

我对耿飚型的人信，她爱好音乐、摄影，学历是教育。
她很能干，不是一般的，什么事都能应付。几次外逃，到
日本，到印度，都是她帮忙的。我家不用她办，她每件事
都可以干。她在美国时帮工，干惯了。

题外话：

毛主席功世有，过世有。

两大功劳：乡村包围城市，革命胜利；

反对苏联，保证了中国的独立。

两大错误：人民公社，文化大革命。

吴建璠讲“翰老恩私难释怀”的事由：

前几年吴建璠在南方征集旧稿，陈翰老去看他，写
了一首诗，说东北的木材多得很，都积压在那里运不出来，
而我国的人才也如这些木材的积压一样，大都是这几个比

喻。吴廷琨认为如此，向陈翰老索取，老根不让给。

1983.1.31 下午5时回王明故居

郭建刘子菊同志谈。

陈翰老还向刘子菊同志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

中国和日本过去都是有悠久历史的封建社会，为防御外部的影响，也都实行过闭关或锁国政策，那么，为什么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，而日本则发展为帝国主义？近代日本的经济又得以高速地发展，而中国和支有许多事物？